

# 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 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  
2009·5  
Society  
第29卷

## 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李黎明 李卫东

**摘要:**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关键词:**市场转型 阶层再生产 二元分割性 市场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再分配机制依然作用于社会某些领域,但市场机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学术界有关市场转型意义的争论也主要由于干部利益受损论与权力继续论这两种观点的争论转向了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论。也就是说,市场转型的特定制度安排使得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社会生态进化的特征。由于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国家作为具有自身利益的主体,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在积极培育和推动市场发展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会限制市场的扩张,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政治与市场不断相互竞争与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的倾向使得再分配者转变为市场管理者(Zhou, 2000),市场在不断催生新的机会的同时,又在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

---

李黎明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李卫东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硕士研究生

本研究的构思最早受益于布迪厄、J.-C.帕斯隆(2004),研究思路受益于李路路(2003)。感谢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支持。

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陆学艺,2004)的基础上有所分化,从而培育出了新的阶层。这些新的阶层凭借其市场能力成为市场的新角力者。因此,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就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李路路(2003:103-117)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社会阶层呈现结构化状况,市场转型并没有改变原有阶层的相对关系,而是延续了原来社会分层秩序和阶层关系。孙立平(2003:1-14)持有与结构化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改革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在特定制度的安排和新生市场的结构下,将底层群体抛出了社会结构;而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小,又使得社会底层与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李强(2004:59-63)等人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呈现碎片化状况,阶层分化表现为多元化。很显然,学界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市场转型而引发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到底呈现为怎样的一种关系模式呢?这正是本研究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将选取大学本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以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来探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间的相对关系模式。<sup>1</sup>

## 一、理论与假设

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被压缩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国家政策不断变化,社会运动频繁,导致阶层内部成员有着不同的沉浮(陆学艺,2004)。那时,社会内部阶层结构处于相对变化的状态,并未形成一个稳固的阶层结构。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运动打乱了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稳定的结构化机制很难形成。尽管1978年以前政治运动影响了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化,但是阶层之间却存在着坚硬的边界。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等身份因素不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机遇,也影响着阶层结构状况,李强(1997:33-41)将这种特征类型的分层称为政治分层。与政治分层同时并存的另一机制就是单

---

1 “阶层间的相对关系模式”是指不同阶层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流动的相对机会分布。“相对流动”主要是比较两个社会集团的后代竞争不同社会位置时的相对优势(参见李路路,2002:105)。

位制,单位既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李汉林、李路路,1999)。国家通过单位将资源分配给个人,从而导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而单位又根据其所有制、级别和规模的不同,拥有不同的资源量,导致不同级别、性质的单位成员所享有的福利和待遇也不同(魏昂德,1992)。正是由于政治分层和单位制等因素的存在,不但导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流动率较低,同时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也受到影响。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机制逐步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形式,社会分层机制也随之被改变,社会结构被重新组合(倪志伟,1989)。但与之相左的理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其特点是原有社会性质不变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变,因此“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宋时歌,1998:26)。这就是说,改革不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是在维持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扩大利益的共享。由于“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的”,“再分配体制内部成长的市场,对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最为有利”(边燕杰,2002:24)。因此,宋时歌(1998:33)认为政权的维系使得干部的权力得到延续,而改革过程中遵循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从官方和民间淡出,政治运动也走入了历史,从而使得干部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不但依然保持了优势,更会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中将原来相对的不平等转变为绝对的不平等。虽然最初市场产生于再分配体制之外,但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并不是平行的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正如周雪光(Zhou,2000:1139-1140)所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转型是“介于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同进化过程”,“在一些领域,政治和市场相互竞争,相互约束,在另一些领域政治与市场又是相互增强,而在另一些领域政治与市场直接相互交换”。就是说,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和再分配表现为相互形塑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不仅要认识权力如何被延续的问题,更需要认识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如何共存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来理解来自不同制度背景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被建构的。

周雪光(同上:1139)用“同进化”的概念分析了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相互演进必然会

影响到阶层结构关系,各阶层之间也必然会表现为相互竞争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这种阶层结构关系也表现为相互形塑的同进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布尔迪厄的动态“场域”来体现。场域指的是“场域内占据位置的人们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为了捍卫或改进他们现有位置而斗争和战斗的竞技场。”场域的形式是一个网络结构,但场域的内容表现为动态过程,“是一种竞争市场的形态”。尽管布尔迪厄赋予了场域更多的斗争性,但他并没有忽视场域结构的维持。布尔迪厄认为各个利益群体会采用相应策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维持某种场域结构的合法存在(瑞泽尔,2005)。因此,中国市场转型背景和转型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市场能力共同决定了场域中不同阶层的位置,转型过程表现为场域中各个阶层位置的占有者为维护和增加各种资源而动用各种策略竞争和妥协的过程。故市场转型也表现为社会上层利益维护、阶层关系复制,以及社会底层向上侵蚀的过程。

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已实施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也正好是代际职业地位承接的一个周期。<sup>1</sup>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大学生正好在新世纪前十年走向社会,而他们的父辈也大多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步入社会。这样,父代可以称为改革后地位获取的“第一代”,而子代可以称为改革后地位获取的“第二代”。由于“第一代”基本上是改革前后步入社会的,他们承接了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层形式。因此,从代际关系来看,“第一代”继承了再分配机制时期上代的一切资本,同时在双轨制下又创造了他们自身的资本;而从阶层结构来看,“第一代”经历了阶层分化的过程,但分化的同时,由于受到市场机制的调控可能也意味着阶层内部聚合的开始。就是说,“第一代”经历了改革后阶层分化与阶层内部聚合的双重效应,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是改革后的第一次代际交接,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代”是改革后阶层分化与阶层内部聚合双重效应的第一次阶

---

1 社会学中生命周期这个概念常用来表示个人、家庭、组织的生命周期,其包含代际和再生产的含义(Angela, et al. 1990),这里借用生命周期的概念对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定义主要是指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代际周期而言。由于父代的职业历程正好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因此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第一代;而在新世纪初,这代人的子代也开始纷纷步入社会,这时正是子代职业地位的开始,两代人恰好步入了地位交替的十字路口,所以将子代定义为第二代。

层继承,这或许意味着结构化的开始。因此,研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际阶层关系对于认识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以及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

**假设 1:**父代的阶层地位影响着子代的职业地位并实现优势阶层的再生产。

**假设 2:**阶层再生产具有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特征。

##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 2007 年 5 月、6 月对西安市 5 所高校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sup>1</sup>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来认识阶层的相对关系,因此,调查对象为 2007 届本科毕业生。本调查依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这 5 所高校大约 17 000 名本科毕业生中抽取样本 2 000 个,回收问卷 1 900 份,有效问卷 1 673 份(其中男 1 070 名,女 603 名)。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不同阶层的代际流动来认识阶层的相对关系模式,是从宏观层面对阶层关系的认识。因此,在模型建立时,我们只选择了 4 个变量,分别为父代阶层地位、子代阶层地位(职业地位)、学科类型和学校级别。

父代阶层地位<sup>2</sup>:包括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经理人员 /

---

1 西安市共有本科高等院校 25 所,本研究依照分层抽样方式随机抽取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等 5 所院校,前 3 所属于部属院校,后 2 所属于省属院校,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生源分布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本研究以市场转型时期政治与市场的关系为理论背景,借鉴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层划分标准,通过将单位部门与职业结合划分了一下阶层结构:脑力劳动阶层,包括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人员、经理人员 /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非脑力劳动阶层,包括自雇佣者、体力劳动者。父代阶层地位的确立是直接采用这个阶层框架,子代职业地位的确立也是以此阶层框架为基础(参见 Robert, et al. 2002: 31 - 44; 赖特, 2006)。

“再分配-市场”是过去常用的分析框架,“那种将国家、集体所有的经济部门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视为与市场对立的“再分配”体制的分析框架,已不能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刘精明, 2006)。随着市场的深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遵循技术理性,因此,这里,我们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操作。党政机关不但处于体制内,而且与中心权力最近。事业单位虽然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威,但事业单位基本上依靠国家财政,接受政府管理和监督,同时在事业单位内部还存在一套党政系统,(转下页)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自雇佣者、体力劳动者 6 类。

子代职业地位<sup>1</sup>：包括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企业管理储备干部、创业 / 回自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暂未就业 5 类。

虽然很多毕业生一开始只是作为管理干部的后备人才被引进，并未直接获得较高的管理职位，但是进入不同级别、声誉的单位和获得不同的职位却有着不同的晋升机遇、社会声望、权力和财富回报。因此，进入级别高的单位和获得资源含量丰富的职位不仅意味着当前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望，获得了丰富的权力和财富回报，也意味着未来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获得更好的阶层地位。虽然学生职业地位和阶层地位还有一定区别，但是由于职业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社会声望，体现了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是未来发展机会和“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仇立平，2001）。因此，我们根据上文定义的阶层结构将职业地位操作为 5 类。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子代职业地位操作过程中，为了体现职业地位资源含量的高低，这里将市级以下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和办事人员合并在一起；将创业和回自家企业作为一个共同的指标来测量新经济领域的代际关系。回自家企业说明阶层地位和财富的直接代际继承，而创业需要经济资本，因此，来自上层的子代毕业生在创业上具有明显优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子代职业地位中包括“暂未就业”的分类，这

---

（接上页）具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因此，将机关事业单位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层级。在体制内，单位级别依然还具有一定意义，级别的不同意味着所拥有的资源、权威和享有的权利是有差别的。在中国，单位有直属中央和直属地方之分，而下到地方又可以再细分，因此，我们这里以地级城市为分水岭，将包括地级城市以上（含地级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分为中高级别单位，而地级城市以下单位分为低级别单位。因此，这里我们将根据城市级别和职位级别来操作机关事业单位管理阶层。我们将省市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职位在处级（含处级）以上职位称为中高层管理者，反之称为基层管理者。

1 子代职业地位框架的确立与父代阶层地位框架的确立是类似的。代际流动的研究通常以社会各个阶层成员为研究对象，将父代阶层与子代阶层作同样的定义。本研究着眼于在本科毕业生职业阶层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代际流动关系，通过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来认识社会阶层的相对关系模式，因此，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阶层地位之间存在定义上的不同。从子代本科毕业生已获得的职业地位来看，所签约的职业地位一般都是非体力劳动职业，并不存在自雇佣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而是存在一个未就业的群体。虽然本研究的代际关系有别于通常的代际模式，但由于导致未就业的原因可能因阶层的不同而不同，获得的职业地位也因父代阶层地位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本科毕业生的代际流动来反映阶层的相对关系模式。

是一个群体,而不是阶层,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在短期的未来将最终获得某个职业地位,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非体力劳动职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群体为何在毕业时没有获得职业地位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阶层背景或人力资本不如其他已获得职业地位的同学。因此,可以肯定这群人获得的职业地位在总体上会低于已经获得职业地位的毕业生。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探究阶层背景对大学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以此来认识阶层的相对关系模式,虽然暂未就业不是职业地位,但却是一个合适的参照项。

**学校级别:**我们将被调查的5所高校分为普通院校、211工程院校和985工程院校三类级别。学校级别既可以看做是结构性要素,也可以看做是人力资本要素。从结构性要素来看,不同级别的学校影响着其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机会。根据制度学派的信号理论,学校级别可以被视为是求职者发出的信号,也是雇主甄别求职者的一种手段。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来看,学校级别又可以看做是人力资本的体现。一般而言,级别高的学校培养的学生人力资本相对丰富。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学校级别都可能会影响毕业生职业地位的获取。正是因为学校级别具有这种意义,所以将学校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可以揭示代际继承是否会因学校级别的不同而有差异。如果没有显著差异,则可以认为在代际继承过程中,先赋因素对毕业生职业地位影响较强烈,社会开放度还有限;如果存在显著差异,则可以反映出自致因素对毕业生职业地位影响较大,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学科类型:**中国大学教育专业化较强,每个专业都是为某类特定职位而设计的。尽管不少人所学专业与其最终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专业还是影响了大部分人的职业未来,因此,专业可能会影响到阶层代际继承。目前国内将各专业划归为12个学科门类,本研究根据这12个学科来收集数据。这里,我们对这12个学科进一步定义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和工农医学科。人文学科和理学重基础研究,而社会科学和工农医学应用性较强。正因为学科的这些性质使得不同类型的学科,其市场需求也不尽相同。

由于对数线性模型具有可以区分绝对流动和相对流动机会(相对流动机会又叫社会流动性)的适当技术和能够将双变量关系分解为多维度模式进行考察,特别是可以将对角线单元(代表阶级结构的稳定

性)和非对角线单元的作用独立地引入模型的优点(甘泽布姆、特莱曼、乌尔蒂,2002),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该模型来分析。

根据以上变量,我们建立了饱和模型:

$$\log F_{ijkl} = \lambda + \lambda_i^{S_i} + \lambda_j^{S_j} + \lambda_k^{S_k} + \lambda_l^{U_c} + \lambda_{ij}^{S_i S_j} + \lambda_{jl}^{S_j U_c} + \lambda_{jk}^{S_j S_k} + \lambda_{il}^{S_i U_c} \\ + \lambda_{ik}^{S_i S_k} + \lambda_{kl}^{S_k U_c} + \lambda_{ijl}^{S_i S_j U_c} + \lambda_{jkl}^{S_j S_k U_c} + \lambda_{jkl}^{S_j S_k U_c} + \lambda_{ijkl}^{S_i S_j S_k U_c} \quad (1)$$

其中,  $S_i$  代表父代阶层地位,  $S_j$  代表子代职业阶层地位,  $U_c$  代表学校级别,  $S_k$  代表学科类型。

子代职业地位  $i$  (1、2、3、4、5、6) 分别为: 省市级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企业管理储备干部、创业 / 回自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暂未就业; 父代阶层地位  $j$  (1、2、3、4、5、6) 分别为: 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经理人员 /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自雇佣者、体力劳动者; 学科类型  $k$  (1、2、3、4) 分别为: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和工农医学科; 学校级别  $l$  (1、2、3) 分别为: 普通院校、211 工程院校和 985 工程院校。

### 三、结果分析

饱和模型检验是对数线性模型检验的第一步。饱和模型检验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饱和模型检验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可以筛选出不显著的变量, 为后面非饱和分析提供基础; 二是可以初步获得变量间的关系。我们将这 4 个变量一同纳入模型, 获得以下结果(见表 1)。

从检验结果来看, 在三阶交互效应上, 子代职业地位 \* 学科类型 \* 学校级别具有显著效应, 说明子代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受学科类型和学校级别的影响。但本科毕业生的代际关系与学科类型和学校类型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并没有通过检验, 也就是说, 学科类型和学校级别对代际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 可以认为子代职业地位与父代阶层地位在代际关系上不因学科类型、学校级别的不同而不同。从学科类型来看, 虽然学科类型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具有较强的影响, 但我们的检验发现代际关系和学科类型不存在显著关联,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具有的重要影响; 从学校级别与代际关系来看, 虽然代际关系与学校级别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没有通过检验, 也就是说无论是来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还是来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在代际关系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 这说明了阶层背景的影响,



但代际关系和学校类型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有显著关联,这说明一定程度上代际关系又受到学校级别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二阶交互效应证实了这种关系。子代职业地位与学科类型和学校级别都存在显著关系,父代阶层对子代学科类型与学校类型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也有较显著的影响。这里我们关心的是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之间的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是非常显著的,就是说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具有显著关联。因此,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认为可以对代际关系与学校和学科分别不作单独分析。

表 1: 饱和模型的偏相关联检验结果

Effect Name	DF	Partial Chisq	Prob.	Iter.
子代职业*父代阶层*学科类型	75	83.311	0.2391	5
子代职业*父代阶层*学校级别	50	66.525	0.0589	4
子代职业*学科类型*学校级别	30	64.156	0.0003	7
父代阶层*学科类型*学校级别	30	30.382	0.4462	6
子代职业*父代阶层	25	127.998	0.0000	7
子代职业*学科类型	15	139.286	0.0000	6
父代阶层*学科类型	15	23.920	0.0665	7
子代职业*学校级别	10	89.226	0.0000	7
父代阶层*学校级别	10	17.744	0.0594	7
学科类型*学校级别	6	638.907	0.0000	5
子代职业	5	395.011	0.0000	2
父代阶层	5	998.468	0.0000	2
学科类型	3	139.257	0.0000	2
学校级别	2	317.372	0.0000	2

饱和分析只提供了各因素之间相对关系的概况,通过检验我们对代际关系有了宏观上的认识,但是这种检验并没有提供关于代际流动或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具体认识,因此,我们通过非饱和分析来具体认识代际流动。

根据饱和模型检验结果,我们建立了非饱和模型 2。

$$\begin{aligned} \log F_{ijkl} = & \lambda + \lambda_i^{S_s} + \lambda_j^{S_f} + \lambda_k^{S_t} + \lambda_l^{U_c} + \lambda_{ij}^{S_i S_j} + \lambda_{ik}^{S_i S_t} \\ & + \lambda_{il}^{S_i U_c} + \lambda_{kl}^{S_t U_c} + \lambda_{ikl}^{S_i S_t U_c} \end{aligned} \tag{2}$$

其中,各符号代表意义同模型(1)。

通过将数据代入模型(2),我们发现非饱和模型检验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饱和模型与非饱和模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2)。

表 2: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检验结果

	Chi-Square	df	Sig.
Likelihood Ratio	328.474	330	0.513
Pearson	364.718	330	0.091

通过非饱和分析,我们获得了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的交互效应(见表 3)。根据研究的目的,这里只对代际流动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表 3: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

		子代职业地位				
		省市级以上 党政事业单 位储备干部	企业管理 储备干部 职位	创业 / 回自家 企业	专业技术 人员	基层管理 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
父 代 阶 层 地 位	党政事业单位	2.791*** (0.451)	1.528*** (0.414)	1.747** (0.571)	0.819* (0.405)	0.831+ (0.425)
	中高层管理					
	经理人员	2.472*** (0.408)	1.471*** (0.353)	2.36*** (0.433)	0.75* (0.345)	0.625+ (0.371)
	/ 企业主					
	专业技术人员	2.193*** (0.33)	1.189*** (0.27)	0.936* (0.459)	1.074*** (0.24)	0.509+ (0.274)
	基层管理人员	1.918*** (0.436)	0.94* (0.372)	0.9 (0.608)	0.708* (0.335)	0.957** (0.341)
	或办事人员					
	自雇佣者	0.68 (0.473)	0.321 (0.325)	0.841+ (0.479)	0.057 (0.283)	0.194 (0.297)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表中未加括号的数据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父代阶层地位以体力劳动者为参照,子代职业地位以暂未就业为参照。

从表 3 可以看出,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具有很强的继承关系,来自脑力劳动阶层的本科毕业生不但更易获得职业阶层地位,而

且更易获得资源含量丰富的职业地位。统计结果具体解释如下<sup>1</sup>：

第一，相对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父代属于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的本科毕业生在流向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创业 / 回自家企业或专业技术职位与暂未就业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分别是暂未就业的 16 倍、4.6 倍、5.7 倍和 2.3 倍。获得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职业地位的概率只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才具有显著性。就是说，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更易获得职业地位，暂未就业的可能性较低。从具有显著关联的代际关系来看，与父代属于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向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创业 / 回自家企业，再次是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最后才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里可以看到，来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更可能继承其父代的职业地位。

第二，与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一样，相对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父代阶层属于经理人员 / 企业主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向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创业 / 回自家企业或专业技术职位与暂未就业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分别是暂未就业的 11.8 倍、4 倍、10.6 倍和 2 倍。同样，在获得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职业地位的概率只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才具有显著性。从具有显著关联的代际关系来看，与来自体力劳动阶层的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经理人员 / 企业主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获得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部门储备干部职位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创业 / 回自家企业，再次是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最后才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里可以看到，与父代属于体力劳动者阶

---

1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本科毕业生，因此在职业地位上不存在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这两个阶层，而是出现了“未实现就业”这个群体。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将“未实现就业”当作体力劳动者阶层来处理（因为这些还未就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可能获得一个职业地位，而且有些还可能是不错的职业地位），而是当作一个参照项来认识脑力劳动者阶层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代际继承的关系。因为无论是从流动机会，还是从流动的质量来看，这些暂未就业的毕业生都可能居于劣势。这也是为何相对于体力劳动者阶层，脑力劳动者阶层子代具有很强的代际继承关系的原因。

层的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经理人员 / 企业主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更可能流入经济部门和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部门储备干部职业。

第三,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本科毕业生相比,父代阶层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本科毕业生流向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创业 / 回自家企业或专业技术职位与暂未就业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分别是暂未就业的 8.9 倍、4.4 倍、2.6 倍和 2.9 倍。获得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职业地位的概率依然只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才具有显著性。从具有显著关联的代际关系来看,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获得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业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企业部门管理职位,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最后才是创业 / 回自家企业。

第四,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父代阶层是基层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向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业、企业管理储备干部职位、专业技术职位或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职业与暂未就业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分别是暂未就业的 6.8 倍、2.6 倍、2 倍和 2.6 倍。与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经理人员 /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本科毕业生相比,父代属于基层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阶层的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有所差别。首先表现在优势相对较弱;其次,父代阶层与创业 / 回自家企业没有显著关联,但在获得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职业上具有显著优势,这说明来自基层管理 / 办事人员阶层的本科毕业生很可能继承父代职业地位。最后,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本科毕业生相比,父代是基层管理 / 办事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在流入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的概率要大于流入其他职业地位的可能性。

第五,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父代阶层是自雇佣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除了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流向创业 / 回自家企业具有优势外,流向其他职业地位并不具有优势。这说明,相比于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经理人员 /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基层管理 / 办事人员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来自自雇佣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和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一样,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处于劣势。这似乎也说明具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在求职

过程中存在阶层的分割,也就是说,来自脑力劳动者阶层的本科毕业生与来自非脑力劳动者阶层的本科毕业生无论是从是否获得职业地位,还是从获得的职业阶层地位资源含量的丰富程度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别。

#### 四、小结与讨论

在早期有关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文献中,发现影响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是父代的工作单位,而不是职业,也就是说再分配权力影响阶层关系(林南、边燕杰,2002;魏昂德,1992)。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研究发现父代阶层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社会阶层呈现再生产特征(李路路,2002)。改革开放至今三十载,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机制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成为主要的资源分配机制,再分配机制的覆盖范围已经从1978年之前的全面控制,缩减到目前主要集中在党政事业单位(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国有企业)。即使这些依然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单位也由于转变为公共服务机构,理性化成为其组织的目标追求,而这种变化对具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产生了巨大影响。来自优势阶层的毕业生在双重机制下更可能继承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阶层地位的继承又因其父代阶层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代际继承呈现阶层分割与共享并存、相对封闭与相对开放并存的特征。

根据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脑力劳动阶层与非脑力劳动阶层的代际继承关系呈现某种“分割性”<sup>1</sup>。这种分割性首先表现在就业与未就业上。从分析结果来看,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来自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更可能获得职业地位,且更可能流向资源含量丰富、工作自主性强和发展机会好的职业领域。需要注意的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与来自自雇佣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在流向各职业阶层地位状况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与来自

---

<sup>1</sup> 李路路(2003)通过对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认为优势阶层与底层存在分割性,存在某种机制对底层进行潜在的排斥,这就是社会结构呈现结构化趋势的原因。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

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相比,自雇佣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入优势职业地位的机会都较少。从脑力劳动者阶层与非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获得的职业地位差异来看,来自非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取最困难,流向资源含量丰富的职位可能性也最低。也就是说,在阶层代际继承关系上脑力劳动者阶层与非脑力劳动者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可能预示着二元的结构化趋势。

孙立平(2003:1-14)认为,目前中国是一个断裂的社会,突出地表现为失业人员被甩出了社会结构,城乡的断裂以及第三次文明浪潮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断裂。虽然断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都反映出底层社会与中上层社会的断裂。虽然具有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在代际继承上呈现出阶层的分割,未表现出阶层的“断裂”,但如果这种脑力阶层与非脑力阶层在代际继承上的分割继续发展,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第二,虽然代际继承呈现阶层的分割性,但在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呈现相对分散的特征。父代是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阶层与子代获得省市级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位的代际继承关系最为强烈,这说明再分配机制路径依赖关系依然存在。相对于其他阶层,父代阶层属于经理人员/企业主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入自主创业/回自己企业的概率也最大。说明在市场机制下,经济资本的继承性增强,新的代际继承模式已经形成。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代与其他优势阶层相比,在流入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阶层地位上概率也最大;而来自基层管理/办事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在流入基层管理储备干部/办事人员职业地位上也具有同样的效应。虽然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的代际继承存在差异性,但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各阶层地位与子代各个职业地位都具有显著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各阶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代际继承,但并没有呈现完全的结构化,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第三,市场转型催生了新的再生产模式,代际继承呈现多元性。边燕杰、罗根(1996:427-456)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机制使干部的权力获得了维系,但这一结论是指干部权力在再分配机制中的代内维系,而本研究却发现,干部权力在再分配机制中还会出现代

际继承。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与子代获得省市级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职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最强烈,这说明权力依然还具有显著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再分配机制在特定环境下依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手段。同时,在市场催生下财富的代际继承影响正显著增强。研究发现,父代阶层地位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经理人员 / 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流向自主创业 / 回自家企业概率很大,而以经理人员 / 企业主阶层的代际关系最强,这凸显出市场机制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第四,代际流动呈现阶梯图式。从阶层的代际关系来看,父代的权力阶层背景对子代本科毕业生获得优势职业阶层地位影响最强烈,其次才是其他脑力劳动者阶层。相对于非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而言,脑力劳动者阶层对子代获得一般资源含量的职业阶层地位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非脑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在获得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等资源含量一般的职位并不存在显著劣势。这里可以看到阶层资本的累积性,父代占据相对较好的阶层地位,会为子代流向更高的阶层地位打下基础,阶层资本在代际间累积。当然,这种阶层资本的代际累积是要以人力资本为前提的,至少从本研究来看,本科学历是代际累积的条件。

这样的结论是让人担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层裂痕,表现为脑力劳动者阶层与非脑力劳动者阶层一定程度上所呈现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意味着社会优势阶层或脑力劳动者阶层对社会优势地位或资源的垄断,对非脑力劳动者阶层进行集体的排斥,仅给来自非脑力劳动者阶层本科毕业生留下基层管理储备干部 / 办事人员这样一个模糊的职业边缘带;而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的代际继承关系呈现一种竞争分化又共同分享的联盟,即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虽然也存在分化,核心阶层占有更大优势,但并没有独占所有优势资源,而是一定程度上与其他脑力劳动者阶层分享。

周雪光(Zhou,2000:1135-1174)将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宏观制度环境的关系定义为同进化的过程,再分配者在通过转变为管理者而延续优势的同时,市场也创造新的机会,催生一批新的受益者。事实上,同进化的过程也意味着转型过程中旧利益群体和新生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沿着同进化这一思

路,将市场转型过程中新旧利益群体看作是社会场域中特定的生态系统,脑力劳动者阶层内部达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体系,并将优势阶层地位继承给予代本科毕业生。也就是说,改革过程中特定的制度安排虽然催生了新的受益群体,但新的受益群体是伴随旧的利益群体身份转变的过程而产生的,新受益群体当中的一部分本身就诞生于旧利益群体之中,因此,新旧利益群体达成某种契合,在竞争的分化和共享中垄断优势阶层地位的继承,阶层代际继承的分割性特征充分体现了这点。这种趋势,提醒我们对市场转型的意义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们在这里套用泽林尼的问题:市场转型理论是目的论吗?斯塔克认为市场转型理论具有目的论倾向,“因为它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正走向一个定义的很好的目标——清楚的、理想类型的市场资本主义”(泽林尼、科斯泰罗,[1996]2002:578-579)。在倪志伟(1989:183-213)看来,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也是就由干部优势向直接生产者优势转变的过程。市场具有平等化效应,能降低再分配体制下的不平等。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中国,权力优势并不一定会受损。中国的市场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展开的,在此背景下的“市场改革是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与再分配体制并行的市场体制,而不是简单地用自由市场代替再分配体制”(宋时歌,1998:33)。同时,随着市场的深化,市场机制逐渐在再分配体制内部生产(边燕杰,2002:24),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具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转变为经济管理者(Zhou,2000),从而使得干部的权力形式发生变化并获得了延续,先前的地位优势也得以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能力成为市场机制的重要分层形式时,产权关系将会形塑阶层结构关系和阶层结构边界,并在市场逻辑的作用下会将已经形成的阶层结构关系的影响持久化,从而将不平等的阶层关系持久化。因此,泽林尼、科斯泰罗([1996]2002:577-578)认为:“无论是市场还是再分配,并没有固定的平等或不平等的后果。他们的后果依赖于他们根植于其中的更为广泛的宏观制度环境”。不少学者将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归类为转型问题,这种归类隐含了阶段性特征。然而从本研究对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分析结果来看,这种归类未免有些草率,对于当前的众多问题,也许更应从制度的角度来寻求答案。



## 参考文献

- 布尔迪约, P.、J.-C. 帕斯隆. 2004.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邢克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边燕杰、罗根. [1996]2002. 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继续: 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G]//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 甘泽布姆、特莱曼、乌尔蒂. 2003. 代际分层比较研究的三代及以后的发展 [G]//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编.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2 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汉林、李路路. 1999. 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J]. 社会学研究(4).
- 刘精明. 2006.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 社会学研究(6).
- 李路路. 2003. 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2002.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 中国社会科学(6).
- 林南、边燕杰. 2002. 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G]//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李强. 2004.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 1997.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 社会学研究(4).
- 赖特, E.O. 2006. 阶级[M]. 刘磊、吕梁山,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陆学艺. 2004.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倪志伟. [1989]2002. 市场转型理论: 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G]//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仇立平. 2001. 职业地位: 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 社会学研究(3).
- 瑞泽尔, 乔治. 2005.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杨淑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立平. 2003. 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宋时歌. 1998.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用——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 社会学研究(3).
- 魏昂德. [1992]2002. 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社会分层[G]//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泽林尼、科斯泰罗. [1996]2002. 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 走向综合? [G]//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北京: 三联书店.

- Angela, M.O', Rand, M. Angela and M.L. Kreker. 1990. "Concepts of the Life Cycle: Their History, Meanings, and Us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 Bian, Yanjie and J.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
- Robert, Erikson and H. G. John. 2002.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
- Szelenyi, Ivan and E.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s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Walder, A. G.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
-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责任编辑: 劳 勤